

編後語

當今中國的公共問題繁多，勞工問題似乎不是一個最吸引眼球的話題。遍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介，「勞工」兩字很難登上頭條。至於知識份子，對勞工的興趣，遠不及霧霾鎖城、「一帶一路」、恐怖主義和「拍蒼蠅、打老虎」。遙想當年，勞動主義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北京大學興盛一時，而今天的高校學子則焦慮於如何在看起來不錯的企業謀得一份工作。蔡元培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上手書的紀念題字「勞工神聖」，現在只能安置在歷史博物館的角落之中。共產主義革命高揚的「勞工專政」、「勞農專政」，一度讓「工人階級」登上「領導階級」的神主牌，但在今天，這早已是過眼雲煙。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出王江松的文章，縱論當今中國的勞工政治。中國的勞工運動在微觀層次上有着活躍的體現，其主要特徵是經濟主義和低組織性，即集體行動的訴求集中在經濟權益，而集體行動具有分割性、短期性和自發性。勞工權益的維護，既不是地方性更不是全國性的重大公共議題。這一方面緣自政權對於高度組織化的集體行動採取嚴格防範和壓制的措施，勞工自然也就成為政府管控的對象，與「領導階級」的朽爛神主牌形成了荒誕的對照。另一方面，在不利的大環境之中，中國勞工運動採取了「去政治化」的策略，固然在制度的夾縫中獲得了生存空間，但也使自身走進了死胡同。

儘管王江松對勞工運動的政治意涵，尤其是對憲政、自由、民主和法治發展的深遠影響，有着懇切的論述和殷切的期待，但難以迴避的是，這些意涵在現實中會遭遇到諸多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的阻礙。制度化的因素暫且不論。從結構上看，不同行業甚至同行業內部勞工利益的分化早已強化，工人階級的碎片化已經日漸顯著，「無產階級大聯合」的可能性早已喪失殆盡。在勞工非階級化的大趨勢下，勞工運動如何與公民社會多元化的發展結合起來，恐怕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大學術議題和公共議題。

在2015年的歲末，中國另一個最具人氣的公共議題，非「全面二孩」莫屬。長期以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一胎化」政策，遭到無數詬病。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即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意味着，「一胎化」政策開始鬆動。短短兩年光景，「單獨二孩」進一步鬆動為「全面二孩」，這意味着計劃生育政策出現了重大轉型。對於這一轉型的緣由，尚有待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學的深入分析。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出劉驥、熊彩、德新健撰寫的論文，考察計劃生育政策為甚麼在改革開放時代而不是計劃體制時期成為中國國策，強調政治理念與經濟戰略的相互作用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霍炫吉的論文分析了大躍進之後重啟的計劃生育，突出了政府在面對經濟壓力之下的公共政策應對。這兩篇歷史考察的論文，無疑可以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當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轉型提供一些借鑒。